

2013年10月21日 星期一

责任编辑:程云 电话:6201407 美工:姚珑璐

版面设计:祁琰 校对:张晗

阎连科: 这个社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朝气



阎连科,河南嵩县人。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,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1978年应征入伍,历任济南军区战士、排长、干事、秘书、创作员,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,专业作家,文学创作一级。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。



《炸裂志》用阎连科自己的话来讲是一部“野心”的小说,“它试图表达我们国家在30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,人心又发生了何种变化。”

小说中,炸裂在3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小村庄发展为一个超级大都市,炸裂人被鼓噪向前,在金钱、权力中挣扎、翻滚。阎连科用“神实主义”的手法,将故事的氛围渲染得荒诞、绝望。关于“神实主义”,阎连科曾有一个简单的定义,“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,去探求一种‘不存在’的真实,看不见的真实,被真实遮盖的真实”。在《炸裂志》中,权力大到可以改变世界的秩序,市长能够对自然界呼风唤雨,而有他签名的白纸竟成了濒死之人的救命良药。阎连科的态度是矛盾的,“它描写的时代是扭曲的、变态的、破碎的,但也是极其蓬勃向前的”“我想这个小说表达了一种焦虑,也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一

种不可思议的朝气。”

这种朝气就像小说的名字“炸裂”。几年前,阎连科去韩国,在一面全是韩文的墙上看到了“炸裂”这两个汉字。翻译告诉他,墙上写的内容是明天将有一个外国学者做演讲,但报名已满,没有剩余的位置。“就是炸裂了”。说这话时阎连科抬起双手向上一扬,他觉得这个词准确地形容了中国30年的发展状况。

谈形式

是地方志也是国家志

新京报:你曾说“不谈结构,就不要谈长篇小说”,那我们就先谈谈《炸裂志》的结构吧,为什么要用地方志的形式?

阎连科:用地方志写一部小说是我非常早就有的想法。我的书架上就有本地方志,是我们县的县志,在翻的时候我就想要用这个方式写一部长篇小说,只是不知道用到哪里合适。直到有一天突然想到一个故事,它的轮廓是一个小村庄变成镇,变成县,变成城市,变成直辖市。它和用地方志讲述故

事的想法吻合到一块,于是就写了这个小说。

我想这个结构的奇妙在于它让一个作家担任地方志的主编。炸裂已经有一个传统的地方志放在那里了,但新上任的市长觉得不合适,想请一个有名的作家重写,于是小说中就有一个叫阎连科的作家,担任了地方志的主编。奇妙就在这里,后面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地方志,而小说是一个伪地方志,就像我在小说最前面写的“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去写志史”。这样就形成

了一种对应关系,有一种书中书的感觉。我的小说好像都有这种书中书的现代性结构,比如《受活》的主体是一本书,但它的注释又构成了另一本书。

新京报:这种书中书的结构是想说明什么?

阎连科:我想它们说明了一种历史的不可靠性,那一本不一定比这一本更真实。今天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段30年的历史,包括80后、90后,甚至00后的孩子,但谁的历史是真的?谁的都是真的,谁的也都不是真

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觉得《炸裂志》是最真实的,它尽可能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国家30年的变化,它是一个地方志,也是一个国家志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改革开放30年成果展,那也是一段历史,它截取它需要的横断面,80年代如何,90年代如何,那种历史是以实践为中心的,但《炸裂志》中的历史以人心为中心,不管你喜不喜欢其中的人物,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成为了一个志的中心、线索,而不再是GDP,书写历史的线索发生了变化。

谈野心

作品或改变小说秩序

新京报:王德威曾说阎连科的世界里,命运的赌盘不停转动,过去的主宰是土地庄稼,现在则换成了金钱。金钱对社会的影响是你在《炸裂志》中着力解决的问题吗?

阎连科:其实要解决什么问题,有什么思考,你脑子是想不清楚的,但是有一点你知道,就是这个故事极具现实性,充满了巨大的信息量。它写了这段历史,这段历史中村庄的变化,写了人心由理想进入欲望,由欲望发展到恶望的过程。而且金钱、权力、女人的遮盖布,在这个小说中彻底没有了。它赤裸裸地表达了权力到底有什么样的能量,比如在村委会当秘书,小姑娘一

直拒绝孔明亮,但当明亮由村长成为镇长,小姑娘的扣子就自动一个一个脱落下来了。

新京报:你提到了这部小说极具现实性,希望表达中国30年的发展。在刊登《炸裂志》的那期《收获》上,刊登了上海评论家程德培写的《炸裂志》评论《现实与超现实的“主义”》,他在其中认为《炸裂志》有些为了刺破现实的面具而陷入符号化的写作,你怎么看这种观点?

阎连科:我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,如果用现实主义的眼光一定是无法理解这个小说的,而用19世纪的小说做参照这个小说也会有很多问题。但换

一个眼光来看,这些问题也许就不是问题。具体来说,人人都喜欢卡夫卡,但卡夫卡的哪一个人物不是符号?卡夫卡哪一个人物能够和托尔斯泰小说的人物比较?我们那么喜欢《百年孤独》,但如果和《红楼梦》放在一块,其中哪一个人物都不如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活灵活现。《炸裂志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,但那可能恰恰是阎连科要放弃的。我们纵观20世纪文学,总体来说,20世纪文学的人物远远不如19世纪文学的人物丰富、复杂和深刻,但是20世纪文学给我们提供的新的思考却是19世纪所没有的。《炸裂志》中在老三身上发

生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说是真实的,他带领一群人拿着枪围着一栋楼,楼就消失了。他的塑造完全放弃了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细节,但他形成了另一种丰满。

新京报:这就是神实主义吗?

阎连科:对,这部小说有一定的野心,它可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秩序,不再是一加一等于二。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全因果关系,卡夫卡是零因果关系,魔幻现实主义是半因果关系,到了这部小说就是内因果关系,只要是精神、灵魂是合理的,就像一条河流的最下边是激荡流淌的,上面的浪花是大是小已经不重要了。

谈当下

社会没有秩序但充满朝气

新京报:因为现实的丰富、复杂,很多作家在把握现实的时候遇到困境,你有同样的困境吗?

阎连科:为什么大家都在写现实,又都不太满意?是因为把握得不准确。我想面对复杂荒谬的现实,我们更需要找到的是一个把握现实的新的方法。在《炸裂志》中我就有这样的尝试,我不去把握现实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大家写的都是已经发

生的事情,但《炸裂志》写的是可能发生,但又没有发生的事情,我想这是有差别的。

新京报:你曾说成功的文学是应该把自己独特的感情融入社会之中,《炸裂志》体现出你对社会现实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的?

阎连科:其实每个作家面对今天的现实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,有的人在文学中表达了,有的人在文学中

不表达。这个小说依然延续了我对中国现实矛盾的、焦虑的态度。首先你不知道社会会向哪里发展,结果是什么样的,我的上一辈人,不管对人如何认识,他们还是相信一切的,但到我这一代人,都有个巨大的怀疑在其中,怀疑什么,你还说不准,但一切都持怀疑态度。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我觉得这个小说也很正能量,它描写的时代是扭曲的、变态的、破碎的,但也是极其

蓬勃向前的。我们出现无数问题,但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人都充满朝气,所有人的脚步都在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走,绝不会是欧洲的暮气。我们的社会忙乱、没有秩序,但每个人好像都是一伸手就能抓到理想的感觉,但理想是什么,能不能抓到,不知道。我想这个小说表达了一种焦虑,也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一种不可思议的朝气。

(据《新京报》)